# 羅香林與客家研究

黄秀政\* 李昭容\*\* 郭佳玲\*\*\*

## 摘 要

羅香林是一位學問淵博,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學者。他在民族史、唐史、族譜學、香港史,特別是客家研究等方面,貢獻卓著,影響深遠,可謂史學界的一代宗師。

根據本文的研究,羅香林的客家研究除了透過討論客家民系與漢民族之間的關係,探討客家人的血統問題外,亦運用族譜來考證「客家民系」實屬漢民族的一支,帶動族譜學的相關研究;並導引出方志研究、語言學等相關課題。尤其是羅氏在其《客家研究導論》與《客家源流考》兩部著作中提出許多新的名詞與觀點,涉及範圍之廣,不僅開啟國內外客家研究的風氣,甚至引發「客家學」論戰,使客家研究成為一門顯學。此外,羅香林對台灣的客家研究,在建立客家意識,重視客語研究,以及建構「台灣客家學」等方面,亦具有重要的影響。

惟羅香林對客家的研究,諸如過於重視客家情感、過份強調客家民系的特殊性,以及過於仰賴族譜的記載等研究態度與方法,則不為吾人完全認同。其客家研究的論點,偶有「見樹不見林」的現象,他對客家的源流及其與漢民族的關係、客家的遷徙與發展,以及客家民系的貢獻等論點,仍有待商権。

關鍵詞:客家研究 客家意識 族譜 漢族

<sup>\*</sup> 黄秀政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sup>\*\*</sup> 李昭容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sup>\*\*\*</sup> 郭佳玲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 一、引言

羅香林(1906~1978),字元一,廣東興寧人。「香林」之名,源出於佛教〈回向文〉「火鑊冰河之地,變作香林;飲銅食鐵之徒,化生淨土。」含有超脫苦厄,普渡眾生的意思;而「元一」,則是本自《春秋》「元者端也」和《尚書》「惟精惟一」之義。「羅氏早年曾以羅漢為筆名,撰稿刊於清華大學週刊,晚年號乙堂,以史部為乙部,表示其終身致力於史學之志。<sup>2</sup>

羅香林畢生致力於歷史研究與歷史教學,而客家研究更為其重要的史學成就 之一。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客家群體意識不斷的提昇,為了對抗客家非漢族的說 法,羅氏致力客家研究,具有學術與社會的意義。再者,近代中國內有客家農村 家族封建社會的封閉困頓及人口過剩;外有日本侵華加劇,海外客家商賈日益受 到排華阻礙。羅氏認爲過去的客家人可在天擇法則下存活,此時面對內外交迫, 必然能夠繼續奮鬥,發揚愛國情操,致力於對日抗戰。<sup>3</sup> 因此客家研究又具備民 族意義。

1930年,羅香林正式提出客家研究或客家學之詞,其1933年刊行的《客家研究導論》建立客家學之初步系統,1950年又發表了《客家源流考》。4 這兩部書中羅氏考察客家的源流與分佈、所處的自然環境、語言與特性,以及客家與近代中國的關係等。其中羅氏提出客家五次南遷路線,以行政區域劃分純客縣與非純客縣,客家人是正統的漢人等觀點,成為日後客家學研究的主流論述。繼起的客家研究,無論贊成是否,或加以闡釋深化,皆須站在其研究基礎上,才能進一步的分析。

羅香林是一位學問淵博,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學者。他在民族史、唐史、族譜學、香港史,特別是客家研究等方面,均有卓越的貢獻,影響深遠。本文的研究,

李纘錚,〈羅故會長二三事〉,收入余偉雄主編,《羅香林教授紀念集》(香港:羅香林教授紀念集編輯委員會,1979),頁112。

林天蔚,〈羅香林傳略〉,收入珠海文史研究所學會主編,《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上)》 (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頁1。

<sup>&</sup>lt;sup>3</sup>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台灣台北:南天書局,1992;原刊於1933年廣東興寧),頁279 ~287。

<sup>4</sup> 羅香林,《客家源流考》(香港:崇正總會,1950)。

特以《客家研究導論》與《客家源流考》兩書為例,論述羅氏對客家研究的貢獻, 以及羅氏對台灣客家研究的影響;此外,並就羅氏客家研究的態度與論點提出商 權,以提供學術界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 二、學術背景與史學成就

#### (一)學術背景

羅香林的父親羅希山,自幼入私塾讀書,受中法、中日戰爭影響,棄科舉而究心時務,致力經史百家之學,其中尤好黃宗羲、章學誠等諸家史學,並兼治漢儒經說,以文史之學名於世。 5 羅氏自幼受其父的影響,無論在為學或處事上皆能針對時弊抒發己見。此外,羅氏在就讀清華大學史學系時,曾受教於陳寅恪、朱希祖、王國維及梁啟超等大師。 6 陳寅恪與王國維是著名的唐史研究學者,此二人影響了羅氏在研究所時期即選擇以「唐史」和「民族史」為其主要治學方向;而朱希祖在考古學上廣博的學識,則啟發羅氏探究古代民族史的興趣;至於梁啟超對近代史的研究,實有助於羅氏自政治史及社會史的角度認清當時中國所處的地位及面臨的困境。可說羅氏在家庭及求學時期受到的教育,深刻地影響其日後治學的方向及態度。

1932年,羅香林受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委託,到廣東調查當地族群的分佈, 其後任職廣州中山大學校長秘書時,即以廣東省通志館纂修的身份,展開方志研究;1934年轉任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講授中國民族史和隋唐五代史,並兼管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審核事宜;1935年,隨南京古蹟調查會到南京考察六朝陵墓, 之後擔任上海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講授南洋史地與華僑概況。1936年,擔任廣州市立中國圖書館館長,並兼任國立中山大學副教授,講授隋唐五代史;1943年, 在重慶與李濟、傅斯年、金毓黻、顧頡剛、黎東方等史學家組織「中國史學會」。 1947年,返回中山大學任教,講授隋唐五代史及史學方法;1948年主編香港《星

<sup>3</sup> 羅敬之,〈羅香林先生年譜初編〉,收入珠海文史研究所學會主編,《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 (上)》,頁10。

<sup>6</sup> 林天蔚,〈羅香林傳略〉,《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上)》,頁2。

島日報》文史副刊,並兼任廣州文化大學研究所史學部主任。<sup>7</sup> 由上述可知,羅 氏在學術教育方面的經歷,對其在學術上的發展亦有很大的助益。

綜觀羅香林的學術生涯,早期因受到軍閥混戰,國內外局勢不穩定的影響, 民族意識特別濃厚,因此致力於民族史與方志學的研究;其後,羅氏以唐代為中 國歷史上光輝時期的代表,認為當中國處於內亂外患的時刻,惟有樹立一個大人 物來作為青年人的模範,才能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因而開始針對人物作專門研 究,並根據族譜來說明客家人對近代中國所產生的影響與貢獻,唐史與族譜研究 乃成為此一時期的治學與著述重點;至於地方史研究則為羅氏1949年舉家遷居香 港後的治學重點,主要是基於地方人應知地方事,開啟香港學界對香港研究的風 氣。8

#### (二) 史學成就

羅香林的研究範圍廣泛,著作等身,其史學成就大致可分為民族史、唐史、族譜學、香港史,特別是客家研究等方面,其獨到的見解,可謂史學界的一代宗師。

民族史方面,羅香林致力於探討中華民族的構成與演進等相關課題。除了說明漢民族與南方百越民族各有其淵源外,對閩粵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來源、生活、語言及習俗亦有深入的研究,並闡述各民族的形成時間及其與中原文化接觸後所產生的變化與影響,以證明與漢民族之間的區隔。

羅香林在唐史研究方面有許多新發現,包含論述天可汗制度下與周邊國家的 緩和關係,以及唐代文化和學術思想對外的影響等。其中以運用考古文物的資料,配合文獻資料的記載,發現在南方出土的佛像及相關石刻作品,無論在流派或藝術表現上,皆迥異於敦煌石窟的風格,考證佛教除了自西域傳入中國外,尚有借道中印南海路線的發現,最為唐史研究者所推崇,開拓了唐史研究的新領域。

族譜學方面,有鑑於中國歷史上各個時期,因戰亂或經濟問題引發大規模遷徙,而形成數個不同的支系。基於族譜與中華民族的文化及血統維繫有一定的關聯性,因此羅香林依據各姓氏譜牒中的記載,研究中原各個民系的形成時間及遷

羅敬之,〈羅香林先生年譜初編〉,《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上)》,頁16~46。

<sup>\*</sup> 林天蔚,〈羅香林傳略〉,《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上),頁4~5。

徙方向。特別是羅氏曾在《中國族譜研究》一書中提出中國族譜具有追根溯源與 尊祖敬宗,推廣人物研究,探求史實,闡述歷史地理關係,推廣良好家庭教育與 遺傳優生,以及推廣中國醫療事業發展六大功能,不僅奠定了其在族譜學的學術 地位,亦建構出其理論體系。<sup>9</sup>

羅香林移居香港之後,除了曾著《1842年以前香港及其對外交通》與《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二書來說明鴉片戰爭前後,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對中國產生的影響;<sup>10</sup> 並針對香港的歷史背景、地理位置、社會發展與著名人物加以研究,不僅開香港史研究之先河,其研究成果亦素為學界所重視,有助於瞭解香港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羅香林對客家的研究更為其史學成就的重要一環。客家研究在某一程度上雖屬民族史的研究範圍,但羅氏的客家研究除了透過討論客家民系與漢民族之間的關係,探討客家人的血統問題外,亦運用族譜來考證「客家民系」實屬漢民族的一支,帶動族譜學的相關研究;並導引出方志研究、語言學等相關課題。尤其是羅氏在其《客家研究導論》與《客家源流考》兩部著作中提出許多新的名詞與觀點,涉及範圍之廣,不僅開啟國內外客家研究的風氣,甚至引發「客家學」論戰,使客家研究成為一門顯學。

## 三、羅香林對客家研究的貢獻

#### (一)考訂客家源流

漢族是混合了無數民族、民系血統而成的東亞民族,約形成於春秋戰國紛爭的時期,而完成於秦漢統一帝國的時期。其後,受到戰爭的影響,漢人南遷避禍,羅香林因而將留在北方的漢人與遷徙至南方的漢人分為南北二個系統,指出北系漢人逐漸與外族融合,而南系漢人則在南遷後受不同環境影響,各自化分出不同的民系,其最顯著的有越海系(今江浙系,操吳方言)、湘贛系(操湘贛方言)、

<sup>9</sup> 白志武、〈羅香林的學術研究述略〉、《嘉應大學學報》、20卷5期(2002,10)、頁113。

<sup>10</sup> 余偉雄,〈恩師羅香林教授研究史學之偉大成就〉,收入余偉雄主編,《羅香林教授紀念集》, 頁118~119。

南漢系(今廣府系,或稱兩廣本地系,操廣府方言)、閩海系(今閩粵福佬系,操閩方言)、閩贛系(今閩贛粵客家系,操客家方言)五個系統。羅氏指出南系漢族經過遷徙分居以後,因客觀條件的影響,分居各系同時並立,各個民系因此成形,此種分化的過程,醞釀於隋唐,完成於宋初。<sup>11</sup>

有關「客家」的源流,長期以來存在著多種說法,除了有所謂客家是漢族支系的論述外,尚有認為客家是苗蠻的別支或古代越族的苗裔,以及未確定客家實在的系屬,只說其不與漢族同種。<sup>12</sup> 為了反駁「客家非漢族說」或「客家是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的混血種說」的觀點,證實客家源於漢族,羅香林以中華民族的構成與演進為出發點,強調中華民族的人種發源於中土,因受環境變遷影響而發展出不同的民系,再以客家語言與古代中原漢族的語言息息相通,且在生活習慣上保留了許多古中原文化,證明客家人乃中原士族後裔,非南蠻支流。

由於客家民系是在不斷的遷徙中逐漸發展出來,羅香林運用客家譜牒中的記載,指出客家遷徙的動機,或由於外患與飢荒,或由於政府的召募與安置,或由於外地經濟的引誘,總共歷經五次的遷徙,逐漸自中原輾轉遷到南方。其五次遷徙,首先是受五胡亂華的影響,中原避難的漢族開始向南遷徙到豫鄂南部與穎淮汝漢諸水之間。其後遭黃巢之亂,便從河南、安徽遷徙到江西或閩南,或是從贛北或贛中遷徙到贛南、閩南或粤北。不久因元人入侵,宋室南渡,客家先民追於外患,再度由贛南、閩南遷徙到粤東、粤北。明清之際滿清入關,加上客家內部人口的膨漲,故自粵東、粵北遷徙到粵中,及四川東部、中部和廣西、台灣部份地區,或是自贛南、閩西而徙於贛西。最後一次則是在清同治年間,因人口激增,乃再向外發展,故自廣東中部與東部遷徙至廣東全境,或是到海南島。

羅香林經由考訂客家的遷徙路線,配合客家聚落的分佈地點,以及客家語言的特徵,提出客家先民的南徙,是源於東晉民族大遷移的第二支派,即所謂司州、豫州流人的南遷。而客家民系的形成應是基於宋代遼、金相繼入侵,導致江淮一帶的居民紛紛遷往閩、粵地區,以期在畬、猺等先住民居住的蠻荒之地,尋找安身立命之地,與各個比鄰而居的民族相互接觸,逐漸發展而來。而今日我們所說的「客家人」,便是當時政府為了便於管理,根據「先入為主,後來為客」的原則,

<sup>11</sup>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頁70~72。

<sup>12</sup> 有關討論客家族派系屬及來源問題的相關著作,可參考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頁12~14。

將原先居住的畬、猺土著稱為「主戶」,而將自北方遷來的漢人叫做「客戶」,繼而形成「客家人」是緣起於「客而家焉」的說法。<sup>13</sup> 可知羅氏不僅具體考訂了客家的形成過程與時間,亦解釋「客家人」名稱的由來,使人們對客家民系能有進一步的認識。

#### (二)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

瞭解一個族群的歷史,文獻資料上的記載固然不可缺少,但文獻資料常因人 為因素而互有出入,必須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對照參證,如此得出的結 論才較具有可信度。例如語言是文化傳承的重要工具,又是區別各個民族與民系 的有力佐證,但語言每隨分佈地點及自然環境的不同而發展出各地特有的方言。 羅香林因此認為研究方言有兩個必須考慮的因素,其一為各該方言詞類、音讀及 語法的調查與分析;其二為各該方言流變的辨證與考釋。<sup>14</sup> 羅氏以語言學中聲紐 分合與韻部分合多寡的方法來進行對客家話的研究,提出客家話的音韻裡保留許 多中原古音,以說明客家源於中原的理論是可以成立的。利用語言學來證明民系 的遷徙及形成年代的方法雖不是羅氏所創,但卻影響日後研究客家課題的學者不 得不重視語言在客家文化中所具有的意義。

除此之外,羅香林為了考證客家的遷徙路線,除參考文獻史料上的記載外,並實際到客家聚落考察,藉由田野調查,自形體上的觀察,血型上的檢驗等不同方式,將客家人與別的種族或其他漢人在形體、血型或智力方面互相比較,綜合分析其異同,再以各地地理環境、社會組織、生產方式的不同,將客家住地劃分成若干區域,分別調查其語句詞彙或韻部聲紐,辨其異同,最後整理出客家的特殊文化或習俗,說明人類活動的進展,常受自然和人為兩種環境勢力所支配,任何民族或民系不能離其環境影響而生存。即是以社會史的角度,探討客家社會是一種以宗族親戚為主體的獨特社群,具有特殊的生活方式與習俗。

羅香林在客家研究中,除了運用文獻史料上的記載來探討客家的社會變遷, 期盼能夠從時間的縱深論述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內涵,將客家源流與中國 移民史相結合;並將家族譜牒與文獻史料相互印證,佐以田野調查與文獻材料的

<sup>13</sup>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頁1。

<sup>14</sup>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頁125。

綜合分析,配合語言學或是社會學等不同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提出所謂客家研究應該就客家課題各個方面,以不同的觀點和方法,交相比較。因此,羅氏可說是第一位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來討論客家課題的學者。

#### (三)開啟客家研究風氣

所謂民族,指的是一群人覺得他們自己是一個被歷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連結起來的共同體。民族本身的特徵,即其個性,既是該民族的構成要素,也是該民族有別於其他民族的標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各民族在經濟文化交流與社會交往過程中,又在某些方面產生了一些共同特徵,此即共性。在民族個性與共性之間,既存在著相互影響、彼此促進的一面,也存在著相互矛盾的一面。<sup>15</sup>

一般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很少深入研究居住在華南地區的民族或民系,基本上多認為他們是未開化且不具研究價值。明末清初以來,基於客家人在海外的經濟勢力逐漸雄厚,以及中國境內太平天國及廣東西路土客鬥案的影響,「客家」這個隱身於中華民族中的一支,開始受到關注,在華南地區興起對客家族群的討論,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後,學術界開始運用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研究中國的人種和民族,其中也包括對客家族群的調查。<sup>16</sup> 但初期相關研究多只限於探討客家源流變革與語言習俗,尚未成為一股研究風氣。

一民系有一民系的特性。所謂特性,與屬性不同,特性是指由各種屬性規範 而成的慣例或性格;屬性則是指構成民族或民系的種種規律。<sup>17</sup> 羅香林認為客家 為避難而南遷,因此多能忍耐痛苦;為保護自身不受外敵侵襲,培養出刻苦耐勞、 團結奮鬥,以及尚武精神。再者,礙於山脈綿亙的結果,耕地缺乏與糧食不足, 加上生存的逼迫,驅使客家必須不斷向外發展;相對地亦因交通險阻不便,外力 難以入侵,導致客家比較能夠保存他們固有的語言和習慣,發展出獨特生活方式 與文化。因此,針對客家研究,羅氏提出客家人是中原血統最純正的正統漢人後

<sup>15</sup> 王東,《客家學導論》(台灣台北:南天書局,1998),頁1。

<sup>16 1930</sup>年代,「客家源流研究會」、「客家源流調查會」等團體紛紛成立,學者如顧頡剛、羅常培、洪煨蓮、章太炎、鍾用和,以及黃遵憲等均致力於客家研究;此外,研究機構如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亦提倡客家研究,並委派羅香林編輯《客家史料叢刊》。王洪友,〈中國大陸客家研究的現狀與今後方向〉,《廣州師院學報》3期(1995),頁90。

<sup>17</sup>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頁240。

裔、客家五次向南遷徙論、以行政區域劃分純客縣與非純客縣、客家人是正統的 漢人、民系概念等論述,無論其觀點是否有值得商榷之處,但確實使客家研究獲 得廣泛討論,甚至引發中外有關「客家」議題的論戰,成為日後客家研究的主流 論調,開啟客家研究的風氣。

## 四、羅香林對台灣客家研究的影響

#### (一)建立客家意識

戰後台灣的客家研究是由中國大陸來台的「新客」所倡導的。1963年,原為梅縣白渡人的中華日報記者謝樹新於苗栗縣發行「苗友雜誌」,後改名為「中原雜誌」,以宏揚客家傳統倫理道德為主;1965年之後,又將原雜誌之客家文化資料集結成《中原文化叢書》,於1965年由中原苗友雜誌社陸續刊行。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雖然早於日治時期的1942年(昭和17年),由任職台灣銀行的日人有元剛譯為日文發行,但在台灣並不通行,直到1975年才由台北古亭書屋發行中文本,羅氏有關客家研究的著作在台灣才容易看到。18

1978年,陳運棟出版的《客家人》是當時台灣第一本關於客家源流及歷史的專書,此後還有1980年廖偉光的《客家民系研究》、1982年鄧迅之的《客家源流研究》、1983年夏忠堅《隱藏的一群:台灣客庄和客庄教會》,以及1985年雨青的《客家人尋根》等。其內容大多討論客家風俗、源流與特質,就羅香林論點加以充實。當時台灣處於戒嚴時期,可看到的客家專著及資料相當少,皆以羅氏的觀點論述客家人為中原正統漢族,帶有濃厚的族群自我中心主義,其客家論述停留在主觀意識的認同,而未能由客觀特徵加以求證。如中原古音、聚族而居、以次葬為主的喪葬制度、以讀書為立家之本的思想等,皆是漢族皆有的特色,但客家人受主觀意識影響才特別強調。直到解嚴後,台灣的客家意識才有進一步的提昇。

1987年台灣解嚴之後,社會展現多元化的樣貌,為反應諸多民意,《客家風雲》雜誌發刊,台灣客家文化運動自此展開。1988年,客家族群發動「還我母語」大

<sup>18</sup> 陳運棟,〈五十年來的台灣客家研究〉,《台灣文獻》49卷2期(1998,6),頁180~181。

遊行,反對偏差的語言政策,訴求廣電法對方言的限制,建立多元的語言開放政策,全面開放客語電視節目,這是首度匯集台灣客家社會的各股勢力,從最初訴求客語的保存,擴大為客家文化的振興。1990年,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立,提出新客家人概念,認為傳統的客家研究過於強調追溯族譜及源流的研究方法應反省,並呼籲當代客家人不應沈溺於過去光榮的歷史,而應積極投入社會,透過政治參與以喚醒社會大眾的尊重。之後客家社會運動蓬勃發展,1997年寶島客家電台獲准設立,2001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正式成立,2003年客家電視台正式開播。其他諸如具備客家特色的油桐花節、義民節與客家美食節之文化活動也紛紛展開。19

目前台灣的客家意識已從主觀的自我認同,發展到展現客家樣貌的文化風采,在台灣社會多元文化並存之下,保存客家特色反而是吸引他人了解及尊重的誘因。新一代的客家人熱心客家山歌及民謠的傳承,更有新的客家音樂創作者如阿淘哥及交工樂隊等出現,客家文化的保存已朝向社區總體營造與文化產業的方向努力。在全球化與在地化並行中,台灣的客家意識已從最初的自我中心蛻變為族群的相互尊重,這是多元文化社會變遷的結果,也是客家人自我意識的提昇。

## (二)重視客語研究

重視客語研究是客家意識的延伸,語言又是探索族群歷史和文化發展的最佳工具,因此羅香林的著作中,客語研究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不僅能佐證客家民系的遷徙過程,又能推斷客家民系的形成年代,更能藉以探討客家社會與文化。台灣的客語傳播受到閩南強勢語言影響,客家人常被閩南人同化,而失去傳承能力;日治時期又受到皇民化影響,必須放棄母語改用日語,客語因此滲入不少日語。戰後國民黨推行國語運動,以北京官話為國語,客家話又成了北京語化的客家話<sup>20</sup>,因此台灣客語傳承長期被忽視,客語研究更是付之厥如。

戰後台灣的客語研究係由外國傳教士所開啟。1950年代,美國天主教馬利諾外方教會的神父至客家地區傳教,為了學習客家話引進法籍神父Charles Rey所編

<sup>19</sup> 劉惠玲,〈台灣客家文化運動與族群建構之研究〉,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 23~19。

<sup>20</sup> 羅肇錦,《台灣的客家話》(台灣台北:台原出版社,1990),頁36~39。

的《客法大辭典》,之後滿思謙神父(Guerrino Masecamo)更領導多人於1960年 完成《英客大字典》,該書固然對西方人學習客家話助益甚大,但對一般客家人助 益不大。

整體而言,台灣的客語研究直到解嚴之後,始由客家意識帶動而發展。受到「還我母語」運動,以及年齡愈低愈無法使用客語的影響,使得客語推廣與研究備受重視。1992年中原週刊主編《客家辭典》,由徐運德、黃緯禎統合完成,此為1949年中央政府遷台以來第一部與客家人生活結合的辭典,重點放在「客家獨有」的字詞;其次還有非客籍人士劉添珍編纂的《常用客話字典》,搜集客語、國語皆可對應之字;再者,1997年李盛發的《客家話讀音同音詞彙》,以客家特有詞彙為基礎,並收錄北京話為本的客語詞彙,亦可供查閱。

學院研究如1957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楊時逢的《桃園客家方言》,是國內第一本以現代語音學理論研究的專書;台灣在地學者則以羅肇錦為研究代表,1977年他以《瑞金方言》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學位,1984年再以《客語語法》獲博士學位,羅肇錦對現代客語研究貢獻是多方面的,舉凡語法、語音、各地次方言的比較,以及客語地位的提昇皆有成果。另一代表為鍾榮富,他運用現代音韻理論分析客家話,並指出客家話研究在記音、構詞與語法三方面為未來值得探討的方向。<sup>21</sup> 自1983年至2004年是客家語言的茁壯期,這期間在台灣各大學撰寫與客家語言相關的碩博士論文計有55篇,其中5篇為博士論文。<sup>22</sup>

政府政策方面,2001年9月台灣的國民中小學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母語教學正式列入學校課程,並加強客語師資培訓。各級學校、社區大學及民間社團等開設客家語言文化課程,公共領域如醫療機構、政府機關、大眾交通運輸等亦建置客語無障礙環境。在台灣客家語言大致可分四縣、海陸、饒平、大埔、詔安、永定等次方言腔調,政府則推動成立台灣詔安、饒平、大埔等3所客語教學資源中心,並建置哈客網路學院,提供開放、多元的數位學習平台,透過網路無遠弗屆

<sup>21</sup> 鍾榮富,〈客家話研究的過去與未來〉,《漢學研究中心》17卷3期(1998,8),頁298。

<sup>&</sup>lt;sup>22</sup> 曹逢甫,〈客家語言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灣客家研究學會編,《台灣客家研究學會成立大會手冊》(2004,2),頁23~26。

的功能,進行客語遠距教學,營造無障礙的客家文化及語言學習環境。23

## (三)建構「台灣客家學」

1950年代到1970年代台灣因處於威權體制之下,羅香林所倡導的客家研究一度停滯。當時台灣的客家書籍沒有超越羅氏的論述內容與觀點,僅補充台灣客家的遷徙資料。較不同的為美國孔邁隆(Myron L. Cohen)及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的研究,他們到美濃或屏東平原,並不是要專門研究客家,而是想找台灣的社區來研究,替代無法去中國大陸實地田野調查的缺憾。因此,他們的研究很少處理客家源流的問題,而是探討生活在該社區居民日常的運作、種種的社會經濟行為,尤其著重在家族、宗族以及婚姻、人口現象等問題的探討。直至1980年代,台灣才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者投入客家移民史研究,人類學者強調客家民族誌研究,探討閩、客族群宗教信仰、宗族組織、家庭生活,以及婚姻與婦女角色之異同。24

後來的台灣研究者發現,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一書雖有專章〈客家的 文教〉介紹客家人的社會組織、人民行業、一般風俗等,但台灣的客家社會已在 特定的環境中,蛻變成不同於羅氏所論述的客家社會,所以若依照羅氏論點,闡 釋客家人是優良民系,無法貼切反映台灣客家文化的特點。因此,1990年代客家 研究已延伸至台灣與閩、粵,以及江南地區,其目的乃在透過區域性與族群性的 比較研究,以瞭解漢文化與其次文化的共同性與差異性。

台灣客家研究是多方面的,如語言、文學、建築、風俗、信仰、婦女、族群等,除了前述語言研究屬傳承性面向,廣受各方重視外,其他研究亦有相當成果。以客家分佈的研究為例,戴炎輝認為泉、漳人先到,所以佔有海濱平原,而為墾戶(業戶,俗稱頭家)、佃戶或營商;客家人後到,故多居於附山地帶,且初時大多為佃戶。<sup>25</sup> 而施添福卻認為,清代台灣漢人分佈的地理區域與其祖籍地及來台先後並無太大關連,主要關鍵在於祖籍地之生態環境。例如來自粵東的潮、惠、

<sup>&</sup>lt;sup>23</sup> 中華民國(台灣)總統府網站,「總統施政之回顧與願景・客家篇」http://www.president. gov.tw/l\_president/achieve/subject19.html (2006/08/29)。

<sup>&</sup>lt;sup>24</sup> 莊英章,〈族群互動、文化認同與「歷史性」: 客家研究的發展脈絡〉,《歷史月刊》201期 (2004,10),頁32。

<sup>25</sup> 戴炎輝,《清代台灣之鄉治》(台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頁296。

嘉應等州及閩西汀州的客籍人士,因已適應原鄉丘陵及山地的生態,入台後也優 先考量類似的生態區為家園。<sup>26</sup>

在客家文學方面,台灣的客籍作家非常多,如吳濁流、龍瑛宗與鍾理和等。在他們的作品可以找到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質,但他們並不會標舉自己的客籍身分,其文學兼具台灣視野與世界視野,奠定客家文學興起的動力。戰後新一代的客籍作家如鍾肇政、李喬、黃娟、鍾鐵民等,並未以族群自我設限,更站在人民觀點反應台灣社會的成長,可以說台灣客籍作家的文學成就極為突出。但台灣客家文學並不等同客語文學,只能說是台灣文學的支流。更何況台灣的客家文學傳達的是在台灣一地生存的寫實面,其表現的不再是客家人飄流遷徙的一面,而是對在地生活及土地的認同感。

台灣的客家移民在歷經三、四百年後,與其他族群文化交流激盪,已產生獨特的台灣客家文化,認同台灣是「日久他鄉即故鄉」。羅香林的客家研究以回應相關文獻的污名與攻擊為出發點,相較於其立場,台灣的客家研究與客家運動也在回應威權體制下,客語的被禁止與打壓,兩者有異曲同工之處。但今日的台灣客家研究已蛻變為客家運動的思想與內容的支撐,並且在學術研究上累積相當的成果,逐漸具備建構「台灣客家學」的條件。以客家為研究對象在各學科領域展開,如歷史學、社會學及地理學等,甚至醫學也專門研究「客家病」。<sup>27</sup> 近年來,北台灣的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與國立聯合大學,以及南台灣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和技術學院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對客家研究皆有相當成果,顯示跨學科及多元的客家研究,對台灣客家學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幫助。

<sup>&</sup>lt;sup>26</sup> 施添福,《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灣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地理叢書第15號,1987),頁180~181。

<sup>27</sup> 所謂「客家病」,係指是「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素(G6PD)缺乏症」。由於患者食用蠶豆後,會發生急性溶血,產生倦怠、頭痛、噁心、嘔吐、寒顫、蒼白、腰痛、發燒、白血球增高、血尿,以及紅血球變型等症狀;溶血現象通常在吃蠶豆後數小時至一、二天之內發生,通常需要緊急輸血,以避免死亡的發生,因此俗稱蠶豆症。總計台灣有十五種以上G6PD的突變體,其中又以客家人患有較多的G6PD缺乏症,因此常稱之為「客家病」。參考朱真一,〈從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素看台灣族群的血緣〉,《台灣醫界》42卷4期(1999,4),頁252~253;另見中華民國行政院衛生署網站,「家庭計畫・認識葡萄糖六磷酸鹽去氫缺乏症(蠶豆症)」http://www.doh.gov.tw/cht/content.aspx?dept=R&class\_no=41&now\_fod\_list\_no=1161&array\_fod\_list\_no=&level\_no=2&doc\_no=5173&show=(2006/09/01)。

## 五、羅香林客家研究態度與論點的商榷

## (一)過於重視客家情感

在中國歷史上,漢族面對四周的他族,常以正統自居,更帶有中華文化的優越感,羅香林的著作也不乏漢族中心主義,充滿對客家特性的強調。其實不限於客家人,即使是廣東人、福建人也常有某種程度的自負。<sup>28</sup> 但羅香林對客家的情感,顯然強過其他民系。舉例而言,羅氏論述客家人是正統漢人時,在強調所有華人從來沒有純粹血統的基本前提下,反覆辯證客家人是較其他漢族「少點混化」。<sup>29</sup> 再者,羅氏在證明客家為中原南遷之人時,所舉例的譜牒中也暗示客家原為中原士族血緣。除此之外,羅氏在〈客家與近代中國〉一文中,詳論客家主導的太平天國之抗清革命,認爲客家人是具有自由、平等的民族思想,在對外戰爭中由鴉片戰爭的抗英、中法戰爭馮子材的抗法、劉永福的抗日,乃至上海「一二八事件」中國十九軍抗日等,皆爲客家人的貢獻。另外,孫中山的革命建國與海外客僑的捐輸,對於民國的建立更是多所貢獻。<sup>30</sup> 換句話說,羅氏論證客家不僅是中原士族後裔,更是優秀的漢族嫡系,在歷代中華文化發展與近代中國建立上,都有舉足輕重的貢獻,這些觀點均充滿客家地方主義的心態。

事實上,客家意識是在客家研究中應運而生的。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認為在進行田野調查時,無法從人的身上得知客家,卻可透過閱讀知道客家。<sup>31</sup> 客家出身的學者戴國煇認為,客家人不論會不會說客家話,都有強烈客家意識。所謂的客家意識,一部分是誇示客家精神,而其具體的內容支柱是什麼,是現在的我不清楚的。<sup>32</sup> 充份顯示客家意識建構的可能性及內涵的主觀性。較具體的客家

<sup>&</sup>lt;sup>28</sup> 這是日本學者瀨川昌久在香港新界田野訪查所獲得的結論。參考瀨川昌久,《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とその境界》(東京:風響社,1993),頁22。

<sup>&</sup>lt;sup>29</sup>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頁72~73。

<sup>&</sup>lt;sup>30</sup>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頁260~268。

<sup>&</sup>lt;sup>31</sup> 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Ethnicity in Taiwan: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ed. by Chen Chung-min, Chuang Ying-chang, Huang Shu-min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4), p83.

<sup>32</sup> 戴國煇、〈「客家」とは何にか〉、《台湾と台湾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求めて》、(東京:研文出版社,1979),頁313。

意識其實是在與他族互動中產生的,即在客家遷徙的過程中形成的。因此,與其 說客家意識是種族的概念,不如說是文化的概念,即自北方南徙的漢人在某一特 定時期,遷入某一特定地區,以其人數和經濟文化的優勢,同化當地居民,並吸 收其中成分,而形成不同於原來北方文化以及原居地的新文化。若是強調客家血 統的純正,以血緣判斷作為判定客家人的標準,是無助於客家精神的。

職是之故,近年來有關客家研究的純正漢人之問題,大多採取修正的意見,即客家民系是經過南遷後,不斷的與其他民系接觸融合而形成,而不再堅持漢人血統純正與否。<sup>33</sup> 有關客家人對近代中國的貢獻,羅香林也有太多的溢美之詞,如在明末抗清所舉的例子中,客家人無論實力規模和社會政治效果等方面,均無法與起自泉州的鄭成功相比擬。因此客家研究若一味從客家觀點出發,容易侷限其視野,變成僅能用客家人的眼光去看歷史文化,卻無法從歷史的眼光,以及社會與族群的角度看客家,如此對客家研究反而不利。王崧興曾提倡多元文化的觀點,超越族群意識的中國論,他認為中華文明的周邊才是帶來中華文明活力的原動力,因此他賦予少數民族在中國文化研究上不可缺少的角色,並且在晚年從事畬族研究。<sup>34</sup> 早在1930年代,羅氏即注意到畬族對客家民系的文化融合關係,若能輔以開放的角度著眼於客家與各族群的互動關係,客家研究應有更多面向的展望。

#### (二)過份強調客家民系的特殊性

羅香林認為客家人乃是西晉永嘉之亂後南遷的中原士族,歷經東晉五胡亂華、唐末黃巢之亂、南宋元兵南侵、明末清初,以及清同治年間五次遷徙,而逐漸播遷至廣東東部與福建西部山區。羅氏透過研究族譜的記載,了解其家族遷徙路線,而得知客家民系的產生。然而就中國歷史而言,南遷並非客家人才有,因此客家民系的遷徙及其形成過程,並不是獨有的現象。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南遷過程基本上是相同的,各民系皆有南遷的歷史,客家研究不應一味強調其南遷歷史及其為獨特、穩定的群體。

<sup>33</sup> 參考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台灣台北:台原出版社,1998),頁143。

<sup>34</sup> 末成道男著、宋秀環譯,〈王崧興教授的學術成就〉,收於徐正光主編,《漢人與周邊社會研究:王崧興教授重要著作選譯》(台灣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頁342~343。

羅香林以客家方言的成形佐證客家民系的形成應是在北宋初年。<sup>35</sup> 然而近年對於客家成形時間卻有不少爭議,張衛東於《客家文化》專書中,認為北方官話在遷徙過程中被帶到吳楚方言的領域繼續發展,形成一個不同於北方官話的次方言,即江淮官話。江淮官話是客家方言的直接源頭,唐末黃巢之亂再度南遷,沿路吸收南方語言的語料,在新的社會區域中逐漸孕育發展,經過南宋末年的第三次大遷徙,才在閩粵贛交界山區形成客家人與客家話,因此唐末宋初僅可視為客家先民脫離江淮官話走向獨立發展的起點,不代表形成。<sup>36</sup> 而唐立宗評述梁肇庭的專書,認為梁肇庭提出客家民系有醞釀期的過程,即客家人在宋元之際來到閩粵贛邊區,之後約有二百多年是客家人適應高地環境生存與客家文化相對安定的時期,所以第三次以後的遷徙浪潮才是客家人形成的主要因素。<sup>37</sup>

厦門大學陳支平針對客家源流有深入的析論,他參考現存閩粵贛及台灣不同 民系的族譜,認為南遷是客族與非客族共同現象,各民族會在南遷過程中出現交 錯融合,而且客家源流受到環境影響很大,因此出現四種類型,首先是客家人與 非客家人南遷時原為同一祖先,同祖分支有的成為客家人,有的成為非客家人; 其次是原為非客家人,遷入閩粵贛山區後,其後裔成為客家人;第三是原為客家 人,遷入非客家區後逐漸變成非客家人;最後是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反覆交錯遷 徙。客家民系與南方民系的主要源流皆來自北方,客家血統與閩粵贛等省的其他 非客家漢人的血統並無明顯差別,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相互融合而成。陳支 平注意向西南遷徙的客家人,與當地人有土客之爭,而向福建沿海等其他非客家 地區遷徙的客家人多被福佬人所同化,在語言、風俗習慣、意識上也不認為自己 是客家人。38

羅香林敘述客家民系的血緣及其形成時間目前大多已被修正,而「客家」一詞之來源也廣泛被討論。羅氏認為,在五胡亂華中原士民輾轉南遷之時,已有「給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襲東晉元帝詔書所定;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戶」的專稱,客家一詞則為民間的通稱。<sup>39</sup> 但陳運棟則認為,北方南遷

<sup>35</sup>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頁19。

<sup>36</sup> 張衛東,《客家文化》(中國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頁59~81。

<sup>&</sup>lt;sup>37</sup> 唐立宗,〈評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及《客家源流新論》〉,《新史學》11 卷1期(2000,3),頁191。

<sup>38</sup> 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頁113。

<sup>39</sup> 羅香林,《客家源流考》,頁42。

的民族,在宋以前越海、閩海、湘贛、南海各系已經形成,最初雖為「客」,然因長久客居以後,已不自知為客,倒變成「反客為主」。在這種情形下,很自然地他們便把宋以後由其他地區南遷來的漢人,稱之為「客」。因此客家的由來,必定是在各個民系形成之後。<sup>40</sup> 陳氏提出「客家」名稱與「客戶」無關的解釋,為客家民系融合的時間提出另一種說法。

#### (三)過於仰賴族譜的記載

族譜的編纂代表父系觀念及身份認同,具有溝通個人及宗族的自我意識,在中國各姓的族譜中,常主動追溯至黃帝或古代王族,作為傳承中華文化的證據。因此,族譜常被視為宗族的代表,用來感受歷史意識的重要工具,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亦視其為史料,以重建社會集團的分化與移動的過程。然而族譜中殘廢人、早夭人(視情況而定)、精神異常人、女子皆不記載,若完全依照族譜,則人口統計會有很大的落差。

羅香林的「譜牒客家學」,運用譜牒建立客家民系,主要依據的族譜大多為父系系譜,以此證明客家人是來自中原的民系;惟若只考慮父系社會,是無法呈現客家歷史的全貌。羅氏認為客家男子在遷徙到閩粵贛後,在血統與活動受畬族影響,而一部分漢化的畬族,也在不知不覺中喪失畬族意識而成為漢族。但羅氏僅將重點放在客家特性的由來,是基於客家遷徙轉移的經歷、固有的社會傳統、新的自然環境因素,以及客家如何同化畬族。<sup>41</sup>總之,羅氏的寫作基調係以父系為原則,並未顯現客家與畬族間的母系關係,可知其主觀意識及運用族譜的侷限性。其被認定非父系的部分,如畬族融合的經過及其影響,都是值得再探討的部分。

譜牒的發達與中古世族政治及門第社會的興起有關。中古世族藉著編纂譜牒 證明其世族身份,以維持政治的優勢地位,所以譜牒在中國歷史具有連結家族和 國家秩序的政治效果。然而下層階級在書寫世系上是空缺的,在士族衣冠南渡的 過程中,流民階級被整編入貴族地主的支配體系內。直至宋代之後,受理學影響, 舉凡祠堂、族田、祭祀、家法、家禮、族長等民間家族制度的結構才逐漸被建立。

<sup>40</sup> 陳運棟,《客家人》(台灣台北:聯亞出版社,1978),頁12。

<sup>41</sup>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頁76。

隨著家族勢力的擴張,修譜活動漸漸頻繁,但與唐朝之前不同的是,修譜的用意不再是別流品、備選舉或通婚姻,而是希望透過修譜來強化宗族的倫理概念,以顯現尊祖、敬宗、睦族,甚至是有效控制族眾的目的。如果了解族譜在中國成形的背景,是可以有理由推測在北方強勢文明「南渡」之下,南方土著民族也有可能摹仿「衣冠」世系書寫,進行譜牒虛構。這樣的情形在台灣平埔原住民族漢化的過程,或是美國南方黑人農奴以地主之姓爲姓的歷史上,都有世系虛構的事例。

歷史記憶可以重新再建構,在歷史中去蕪存菁,去掉不願留下的,留下想記憶的,集體記憶即是一種社會性建構的概念,不同的團體會存著不同的集體記憶。王明珂曾探討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的關係,他認為集體記憶維繫著族群的認同,因此常會被建構及刪除,研究集體記憶及結構性失憶有助歷史研究「過去」的本質。42 由此觀念可闡釋羅香林直接以譜牒為客家源流證據,就「再生產」譜牒神話,譜牒神話有可能成為虛構集體記憶的一部份。陳支平也曾提出族譜運用的問題,他認為羅氏過於依賴客家人的族譜分析,其內容雖然豐富,但不免真偽參雜,往往將祖先追溯至歷代重要名人,如漢代劉邦,唐代李世民,宋代朱熹、李綱等,皆被客家諸姓氏族譜信手拈來攀附為祖先。族譜修纂者也為了將祖先偽託的官職功業確認無疑,記載許多名人贊詞及皇帝敕文。但透過官職考證,可發現族譜記載與當時制度不符,尤其明清以來的職官科舉,大多有案可查,隨意假冒更容易露出破綻。43

## 六、 結論

民國以來,客家研究或客家學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其所以逐漸受到重視, 乃至成為「顯學」,與羅香林的倡導與研究有密切的關係。1930年,羅氏正式提出 客家研究或客家學一詞;1933年,刊行《客家研究導論》;1950年,發表《客家源 流考》。羅氏此二部有關客家的研究,開啟客家研究的風氣。

《客家研究導論》提出客家五次南遷路線,以行政區域劃分純客縣與非純客

<sup>42</sup>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7)。

<sup>43</sup> 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頁160~168。

縣,客家人是正統的漢人等觀點,成為日後客家研究的主流論述;《客家源流考》 除考訂客家的源流及其遷徙外,並就前者的論點加以闡釋。綜括而言,羅氏對客 家研究的貢獻除了開啟客家研究風氣之外,他對客家源流的考訂,運用社會科學 的理論與方法研究客家也有重大貢獻。

至於羅香林對台灣客家研究的影響,首先是建立台灣客家意識。1987年解嚴之後,台灣從最初重視「原鄉」及「尋根」,轉而認同台灣的客家文化。在全球化與在地化並行中,台灣的客家意識已從最初的自我中心蛻變為族群的相互尊重,這是多元文化社會變遷的結果,也是客家人自我意識的提昇。其次是重視客語研究。近三、四十年來,台灣陸續出版客語辭(字)典與客語研究專書,2001年9月國民中小學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母語教學正式列入學校課程,並加強客語師資培訓;政府並推動成立台灣客語教學資源中心,建置哈客網路學院,提供開放、多元的數位學習平台,透過網路無遠弗屆的功能,進行客語遠距教學,營造無障礙的客家文化及語言學習環境。第三是建構「台灣客家學」。1980年代以來,台灣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者投入客家移民史研究。這些研究是多方面的,除前述的語言研究廣受各方面重視外,其他領域亦有重要成果。凡此均直接或間接受到羅氏著作的影響。

惟羅香林對客家的研究,諸如過於重視客家情感、過份強調客家民系的特殊性,以及過於仰賴族譜的記載等研究態度與方法,則不為吾人完全認同。其客家研究的論點,偶有「見樹不見林」的現象,羅氏對客家的源流及其與漢民族的關係、客家的遷徙與發展,以及客家民系的貢獻等論點,仍有待商榷。



## 參考書目

王明珂

1997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

王東

1998 《客家學導論》。台灣台北:南天書局。

台灣客家研究學會編

2004 《台灣客家研究學會成立大會手冊》。台灣台北: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余偉雄主編

1979 《羅香林教授紀念集》。香港:羅香林教授紀念集編輯委員會。

施添福

1987 《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地理叢書第15號)。台灣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徐正光主編

2001 《漢人與周邊社會研究:王崧興教授重要著作選譯》。台灣台北:唐山出版 社。

珠海文史研究所學會主編

1992 《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台灣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陳支平

1998 《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台灣台北:台原出版社。

陳運棟

1978 《客家人》。台灣台北:聯亞出版社。

張衛東

1993 《客家文化》。中國北京:新華出版社

戴炎輝

1979 《清代台灣之鄉治》。台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戴國煇

1979 《台湾と台湾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求めて》。東京:研文出版社。 瀨川昌久

1993 《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とその境界》。東京:風響社。

羅香林

1950 《客家源流考》。香港:崇正總會。

1992 《客家研究導論》。台灣台北:南天書局。(原刊於1933年廣東興寧)

羅肇錦

1990 《台灣的客家話》。台灣台北:台原出版社。

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Ethnicity in Taiwan: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ed. by Chen Chung-min, Chuang Ying-chang, Huang Shu-min。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王洪友

1995 〈中國大陸客家研究的現狀與今後方向〉、《廣州師院學報》3期,頁89~96。 白志武

2002,10 〈羅香林的學術研究述略〉,《嘉應大學學報》,20卷5期,頁112~115。 朱真一

1999,4 〈從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素看台灣族群的血緣〉、《台灣醫界》42卷4期, 頁252~256。

唐立宗

2000,3 〈評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及《客家源流新論》〉,《新史學》11卷1期,頁189~200。

莊英章

2004,10 〈族群互動、文化認同與「歷史性」: 客家研究的發展脈絡〉,《歷史月刊》201期,頁31~40。

陳運棟

1998,6 〈五十年來的台灣客家研究〉,《台灣文獻》49卷2期。頁171~189。

鍾榮富

1998,8 〈客家話研究的過去與未來〉、《漢學研究中心》17卷3期,頁289~301。 劉惠玲

2005 〈台灣客家文化運動與族群建構之研究〉,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中華民國(台灣)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1\_president/achieve/ subject19.html (2006/08/29) °

中華民國行政院衛生署網站:http://www.doh.gov.tw/cht/content.aspx?dept=R&class \_no=41&now\_fod\_list\_no=1161&array\_fod\_list\_no=&level\_no=2&doc\_no=5 173&show= (2006/09/01)。



## On Lo Hsienglin and Hakka Research

Hsiu-cheng Huang\* Chao-jung Li\*\* Chia-lin Kuo\*\*\*

#### **Abstract**

Lo Hsienglin is one of the most renowned researchers in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He is also well known in various fields of history studies including the history of race, the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the research of clan register,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Lo w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historians of his tim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pplied by Lo on his Hakka studies. Lo analyzed Hakka's bloody relatives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kka and the Han race. He also applied the clan register in his studies to show that the Hakka is originated from the Han. Lo's studies have promoted the study of Hakka from other disciplines such as topographical records and linguistics. In his two books, "The Introduction to Hakka Studies." and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Source and History of Hakka", Lo proposed several new perspectives regarding to the studies of Hakka which are so influential that studying Hakka has become popular among other subjects. Lo Hsienglin is an important figure on Hakka language and cluture studies. Lo's Hakka studies hav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academia in generating the Hakka identity,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Hakka language, and building the "Taiwanese Hakka Studies".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Lo's studies on Hakka related topics, his studies have

<sup>\*</sup> Hsiu-cheng Huang,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sup>\*\*</sup> Chao-jung Li, doctoral student of History at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sup>\*\*\*</sup> Chia-lin Kuo, graduate student of History at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歷史學報 第十八期

been criticized for overemphasizing the uniqueness of Hakka and replying too heavily on the data from clan registers. Lo's studies, therefore, are been narrowed to certain angles of the whole stories which make his viewpoints on the literature subject to further investigations.

Keywords: Hakka studies Hakka identity clan register Han race

